



走向思想解放之路

纪念“实践标准”一文发表二十周年

张异宾 编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走向思想解放之路

纪念“实践标准”一文发表二十周年

张异宾 编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走向思想解放之路

——纪念“实践标准”一文发表二十周年

张异宾 编

*
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南京大学内 邮编 210093)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625 字数 160 千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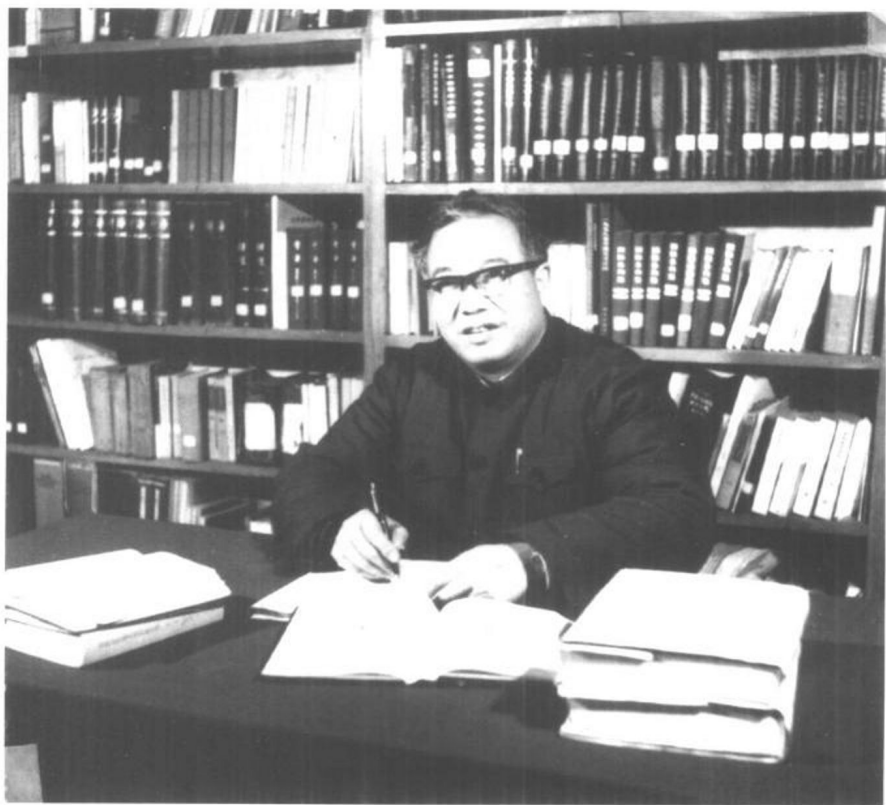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305-03262-X/B·192

定价：15.00 元

(南大版图书若有印、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)



胡福明教授近影



胡福明教授在修改“实践标准”一文



胡福明教授在南京大学讲课



1979年夏，胡福明教授在安徽出席
关于“实践标准”问题的理论研讨会

哲15末

护。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，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。尊重实践，尊重事实，尊重科学，毫无偏见，是他们唯一的尺度。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，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材料。马克思恩格斯对待《宣言》的态度告诉我们：坚持马克思主义，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、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，并非维护每个字句和个别结论。事实上，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句话，每个结论，必须弄到谬绝伦的地步。坚持实践标准，就是科学态度，否认实践标准，就会陷入教条主义。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科学的典范。事实上，人类的认识过程，必然是从不知到知、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完全、比较确切的认识的发展过程。毛主席指出：“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，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。许多理论是错误的，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。”又指出：“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，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。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，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边疆。”（《实践论》）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，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，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、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，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，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。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。如果认为认识是不会犯错误的，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，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。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，还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四

机会主义以理论为幌子和分裂为旗帜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，王明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表现得尤其突出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最响亮，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最猖狂。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，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，在实践中充实和发展。王明反对实事求是、调查研究，否认理论与实践统一，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。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判王明说：“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，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好看，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，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不少的人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，似乎只要得了它，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。这是一种幼稚者的鲁莽，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。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，就是这种鲁莽无知的人。”（《整顿党的作风》）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宗教教条，来指导革命，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向绝路。只是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并取得了胜利，才挽救了党，挽救了革命。

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伎俩，把经过歪曲和篡改了的个别词句当成一根根打人的棍子。王明的特点是摘取马列著作的片言只语而阉割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，抛弃马列主义的

“实践标准”一文清样（局部）

胡福明的信

王强华同志：你好！收到你的来信，很高兴。来信中谈到的许多问题，我都认真地读了。特别是关于“实践标准”问题的讨论，我认为这是当前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：

首先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。任何理论，无论它多么完美，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。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，才能证明它是真理。否则，它只能是主观的臆断。

其次，实践是发展的。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。随着实践的深入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真理看作是僵死的、一成不变的，而应该看作是生动的、发展的。

最后，实践是群众性的。实践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活动。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，才能推动实践的深入发展。

以上是我对“实践标准”问题的初步认识。希望与你共同探讨，共同进步。

王强华 敬上

1978年10月19日

王强华同志：你好！收到你的来信，很高兴。来信中谈到的许多问题，我都认真地读了。特别是关于“实践标准”问题的讨论，我认为这是当前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：

首先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。任何理论，无论它多么完美，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。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，才能证明它是真理。否则，它只能是主观的臆断。

其次，实践是发展的。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。随着实践的深入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真理看作是僵死的、一成不变的，而应该看作是生动的、发展的。

最后，实践是群众性的。实践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活动。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，才能推动实践的深入发展。

以上是我对“实践标准”问题的初步认识。希望与你共同探讨，共同进步。

王强华 敬上

1978年10月19日

《光明日报》社王强华同志 1978 年 元月 19 日给胡福明教授的信



匡亚明校长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主持
关于“实践标准”问题的理论研讨会

目 录

经历片断·····	(1)
访谈录·····	(20)
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·····	(27)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·····	(70)
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·····	(80)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·····	(89)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·····	(103)
“四人帮”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·····	(115)
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(125)
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·····	(144)
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·····	(203)
编后记·····	(239)

经历片断^{〔1〕}

我生于1935年7月中旬，阴历6月19日，阳历大约是7月19日左右，未去搞清楚，反正是差一个月吧。我是无锡县长安乡人，现在叫锡山市，离无锡县城20里，在北门乡下，离江阴马镇只有两里路。家里很穷，只有近三亩自田。自田就是自有的，租田一亩半，一共那么多。那时我家共七口人。解放前我死了两个弟弟，因为生病无钱医治，家里很穷从来没有请过医生。还有一个弟弟两岁时就送给人家了，因为家里养不活，无法维持。解放前确实很艰苦，春天就把红花草跟米拌着拿来吃，到秋天就吃南瓜加面粉，还有就是吃糠饼、麸皮饼。

解放前，我小学毕业，其中因没钱交学费，失学过半年。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喜欢读书，这个家里还是同意的。1948年秋，我到镇上初中补习班读书。家离学校有三里路远，走读。初中补习班只有一个年级，在班上我的成绩较好。1949年4

〔1〕 本文系根据作者口述整理，并经作者审定。

月，无锡解放了，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转折点。解放以后我参加了借粮、征粮工作，秋征、夏征，而且参加了土地改革。我家分到了一部分地，一亩半的租田变成了自田，又重新分到了两亩半田。我的一个二哥，原是搞地下工作的，他在乡政府工作。人民政府把我们乡里这个初中补习班办成了中学，叫长安初中，所以我读了初中一年补习班，就升初中二年级了，我就正式变成了中学生。

我是1949年9月份参加的共青团，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土改时，我是乡团支部的组织委员，全乡只有一个团支部。1951年夏天，我初中毕业。初中毕业以后我没有直接上高中，因为没有钱去读书，只好在家里种田了。我十二三岁就下田干活了，插秧、翻地、耘草等苏南水稻田的农活我全会，就是不会用牛耕田，因为我们家不养牛，所以没有学会耕田。种了半年田，我就去考了江苏省无锡师范春季班，那里吃饭不要钱，不交学费。我读了三年书，每逢星期六下午我就回家去，礼拜天劳动一天，来回步行40里地。夏天又回家种田，夏忙与秋忙我还得请一个星期的假，回家种田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我家已经分家，父亲不久去世了，我与母亲、妹妹三个人一起生活。

有一年，我记得是夏天，当时组织上要我去参加学生夏令营，因为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。我说不能去，要回家种田。因此，这三年里我读了不少书，确实是用功读书的。星期一刚蒙蒙亮就从家里出发，早饭前到学校，一直到星期六下午，这段时间里我都在学校读书。所以这段时间在学校里基础打得比较好，很用功。开始好像还跟不上同学们，但是不到一年，我的成绩已经靠前的了，并担任了学校黑板报的总编。后来我当上

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。

1955年2月毕业后，我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。按一般惯例，师范毕业生是当教师的。班上有八个同学去当中学教师。工作以后，我仍然认真读书，还努力工作。晚上我是从来不外出的。我在这里工作到8月31日，直到去北京大学读书。八个月里面除了去过雨花台凭吊烈士以外，中山陵、明孝陵、灵谷寺我都没去过。另外还去过一次玄武湖，是应我分配在省总工会的同学刘光裕之约，两个人一起去的。

我进北京大学后选了新闻专业。但是，我很快发现，做新闻工作需要敏锐的头脑，需要观察研究社会的科学世界观、方法论。于是，我自己到哲学系去听选修课，自学哲学。后来兴趣逐步转移。毕业时，开始要把我分到中央报刊去，我也愿意，很高兴。但后来总支书记找我谈话，说要把我送到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去学习。当年中央教育部有一个决定，就是要培养一批年轻的理论工作者，培养一批年轻的理论教员，要从应届大学生中选拔那些有志于学习的人，时间是三年。我们系主任罗列找我谈话的理由很简单：你在学校里非常喜欢哲学，你还比较年轻（其实我已经不年轻），比较坐得住，有读书的积极性。当时挑了两个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现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。我们两人是新闻系不同的班，我是一班，他是二班，后来在一起了。

我在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三年，是学得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大学读书，“大跃进”后要下去劳动。到了人民大学已经是1959年9月初，很快就是三年困难时期。闭门读书就在这个时候，三年中基本上都在学校读书，出去劳动只是短暂几

天。那时埋头读书，非常勤恳。我与杨春贵的基础原本就较好，都能认真读书，又花了三年苦功夫，所以成绩不错。

在人大读了三年多书，我不敢讲别的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我是掌握了。就哲学史来说，西方哲学、中国哲学史都知道点皮毛，有个基本概念。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的是苗力田，他是个很好的教师。张世英、贺麟他们都来讲课，讲《精神现象学》、《小逻辑》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学习，在这个时期中，我主要是从《费尔巴哈提纲》开始，到《神圣家族》、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等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我也下了功夫。后来分配时，人民大学一再挽留我，系里肖前等同志找我谈过六次。我没有留下来，主要原因是我妻子在无锡。当年大学的一个助教、讲师要把妻子从南方调到北京是不可能的事，因此，我就决心到南京大学。南大有名额，学校就同意我到了南大。我是1962年11月中旬（20日）到南大报到的。到南大以后，我就给李华钰同志当辅导老师，不到两个月就独立开课了。她当时讲原理，我是讲毛泽东思想，从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到第四卷。我的学生是南大第一届学生（指政治系的学生——编者注）。步惜渔、顾介康（现任江苏省委副秘书长），都是这个班的学生。这班人是我系的嫡系学生，我给他们上了近两年课，一个星期四小时。我总觉得南大的环境，老师与老师之间，至少在哲学系里面（当时叫政治系）环境是好的，相互间还是不错的，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矛盾，同志之间还是比较亲切、比较宽和的。当时哲学系还没有发现一天到晚搞摩擦的事情，这样挺好。

匡亚明校长到南大后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抓科研，抓教育，要把科研搞上去，要把教育搞上去；他还抓建设，教学大楼也

是他来以后才搞起来的。匡校长来了以后办学方针与以往不同,提出了办学要搞现代化。他的观念是教育设施,特别是科研设施要搞现代化,要搞现代化的实验室,要搞现代化的教育设施。他认为艰苦不应表现在科研设备很落后这些问题上。他当年抓教育改革就在政治系试点,从一年级开始抓。他亲自来上课,讲毛主席的著作;他强调自学为主,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,要学习毛泽东的学风。他主张因材施教,坚持学生要重点培养。

后来,我到海安参加“四清”,了解了穷困的地方,了解了苏北。以前我只是了解苏南农村。当时苏北的农村,老百姓很苦,基本上是住草房子,而且许多很破烂,老百姓吃胡萝卜叶子,生活很贫困。当年我们私下议论,这个地方草房变瓦房要多少年啊?老百姓吃饱饭要多少年?说在最好的情况下,老百姓住上瓦房要20年,那是1964年年底的事。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多,所以,我对中国的问题还有一点认识。好多农民仍然缺少粮食,好多农民孩子都没上学,而且女孩子基本上都不上学。一个大队里面就是那么一间破房子,一个班的学生,上课就是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老师。我们住在农民的猪圈旁边,跟他们一同吃稀饭加胡萝卜叶子,我们叫它“洪湖水,浪打浪”。我们一个星期可以上一次街洗澡,名义上是洗澡,实际上是加餐。上饭店吃一顿,就是一斤猪头肉,每个星期都这样子。这一斤猪头肉是必须的,如果没有这个加餐的话,我们很难维持下去。那个时期中午从生产队回队部,经常走不动。这使我认识了农村,使我认识了老百姓的艰苦。

我们江南也有一个困难时期。1960年冬天我从北京回

家,家里粮食不够吃,吃榆树皮,吃观音土。我把在北京买的点心、糖都带回家。那时候每人每月有一张点心票,可以买半斤糕点,还有每月二两糖。我把半年的集中起来,都带回去。我这个人有一点敏感性,困难时期刚刚开始,我就意识到了。我买了20斤红枣,那时街上还有卖,20斤红枣已经很多了,全部都带回了家,还有余下的粮票。我母亲说,这些东西救了家里的命。家里基本上断粮了,就靠吃糠粉、吃树皮粉、观音土,还把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。我母亲就把红枣拿一点,然后与观音土、榆树皮掺和在一起拿来吃。那时农村不少人生浮肿病,还有非正常死亡的。这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。看到那个情景我是要掉眼泪的。老人说,我们无锡历史上没有60年这个灾难,这是事实。所以,我当时坚定地认为不是天灾,而是人祸。我们家乡老百姓也不承认是天灾。直到今天,有些老人还会告诉你,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家里存一年多余粮,足够吃两年,说是他家的家训。要有两年的粮食,一部分是当年的,还有一部分是另一年的,就是一粒不收也能活下去。无锡这里人家的存粮是很足的。教训哪里来的?60、61年得来的。要了解中国社会,这段历史必须了解。在社会调查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搞好。我今天仍认为我们南大的文科学生搞社会调查,到农村,到工厂,不是多了,而是少了,不了解社会。不了解社会怎么跟人们交流啊?怎么反映中国社会的问题?

后来,我们到溧阳去搞分校,匡校长的口号是半工半读。我们是步行着去的,有两百里路远。文科三个系的一年级学生,我是党支部书记,郭维生同志是队长。我们两人带着这一百多学生拉着板车去的,十辆板车装着行李,走了三天。到了

溧阳，劳动虽然艰苦，但大家还是觉得比较舒畅。当时在溧阳分校，文科三个系合并成一个系。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1966年6月2日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贴了一张大字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，当时我也没在意。我当时很麻木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到了中午吃饭时发现贴了好多大字报，内容是批评南大党委，批评匡校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。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呢？就是对待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路线。中文系出了两本书，是研究三十年代文艺的论文集，于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的一个人，给南大党委写了封信，说这是文艺黑线，要批判。匡亚明同志写了个按语，强调这是个学术问题，可以讨论。这样分校马上就乱了，总支立即开会。当时我是总支委员，康贻宽是书记，徐福基是副书记。总支委员还有秦向阳、熊生宝。总之，大家都不赞成大字报，决定当天晚上召开分校党员大会。我在会上发了言。我是这样表态的：北大的情况我不了解，但是南京大学不等于北大，匡校长不是陆平，我们不要简单地推论、等同。我认为，匡亚明同志在南大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是正确的，领导我们搞半工半读是正确的，这些大字报是不好的。基本观点是这样。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，就是批判写第一批大字报的同志，还有动手动脚的。第二天又贴了许多大字报，批判这些大字报，是学生自发的，两军对阵。一张大字报就把溧阳分校给分裂了，很快形成了两派。

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分校里是暂时沉寂下去了。批评学校党委、批评匡亚明校长的大字报没有了，反批评的大字报后